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赵梅春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突破了史部目录解题式的研究和撰述模式,建立了以史学与时代互动为视点的史学史学科新体系;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在古代史学批评、史学思想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等新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有关中国史学通史与断代史撰述、专题史和个案研究向纵深发展;重视学科基础建设,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关注史学发展最新趋势,探讨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史学发展的影响。这些说明,中国史学史学科继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高潮之后迎来了又一发展高峰。

【关键词】改革开放 中国史学史 新进展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8) 03-0011-1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史学研究也迎来了学术的春天。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史学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开拓,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如果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高潮,那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则是其发展的又一高潮,并且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远远超过了前者。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的丰富方面,更体现在新的研究模式的建立与新研究领域的开辟、有关学科建设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对近现代中国史学和少数民族史学的重视,以及史学发展中新问题的关注和探讨等方面。

一、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

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始于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在80年代初曾指出:在新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他认为有两个问题要予以特别的关注,“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①这里所说的“旧的躯壳”,是指20世纪前期受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影响所形成的研究与撰述模式。这种模式以史官、史家、史著为基本内容,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是其代表作。在白寿彝看来,“金毓黻就是在梁启超的蓝图上填写了史书的目录,有时对这些书做了简单介绍和评论。”《中国史学史》“带有

【收稿日期】2018-07-29

【作者简介】赵梅春,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通史撰述与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项目编号:15XZS001)阶段性成果。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3页。

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①，必须突破这一模式，史学史学科才能进入新阶段。

早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初，史学研究者就有建立新的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意向。当时因编写高校文科“中国史学史”教材的需要，学者就史学史学科性质、任务、基本内容、中国史学史的分期以及编写体例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试图超越梁启超模式。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白寿彝提出“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既是对被“文革”中断的学脉的延续，更是新时期史学研究者对史学史学科建设期待的反映。

尽管在有关中国史学史学科性质、研究任务、基本内容、分期等具体问题上，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赞成“作为一种学术门类，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和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有着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务。”^②这种理念反映在研究实践中，表现为力图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窠臼，从史学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展示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阶段性特点与规律。如果说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史学史研究还受书目解題式撰述模式的影响，那么九十年代以来已彻底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有论者将这种新体系中国史学史概括为“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③，以别于史部目录解題式研究模式。

二、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拓展

白寿彝所谓“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是要求史学史研究走出以史家、史官、史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藩篱，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他看来，这是建设新的史学史科学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20 世纪中国史学、以及少数民族史学等进行了探索和发掘，同时也关注中外史学的交流与互动，突破了史家、史官、史著范围，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这里仅就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少数民族史学两个领域略作论述。

1. 有关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清理与发掘

20 世纪八十年代，在广泛引进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背景下，中国史学是否有理论这个问题困惑着史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人。为此，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进行深入的清理和发掘。郑敬高通过对古代史学理论的内容及其特点的考察，指出中国古代的史学认识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形成了史学理论体系，并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④。杨翼骥、乔治忠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并在表述上具有自己的特点^⑤。

在发掘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方面，瞿林东、吴怀祺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以丰富的研究成果澄清了人们在中国史学是否存在理论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瞿林东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等文中，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发展脉络及其特点。所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阶段性特点，填补了有关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空白。所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从丰富的史学遗产中提炼出一系列史学批评范畴，并通过对这些范畴的梳理、分析，建立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体系。

吴怀祺所著《宋代史学思想史》以宋代重要的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思想为核心，从宋代社会历史和社会矛盾出发探索宋代史学思想发展历程和特点。所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对中国史学思想史进行贯通性考察，一方面将史学和经学、玄学、理学等思潮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以史学的“二重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6 页。

②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 页。

③ 张越《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学术研究》2007 年第 11 期。

④ 郑敬高《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⑤ 杨翼骥、乔治忠《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南开学报》1995 年第 5 期。

性”为主线贯穿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以此把握中国史学思想的特质,从而体现出一种纵览全局的通识。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对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作了更深入细致的发掘,向世界展示中国史学丰富的理论成就。

瞿林东、吴怀祺有关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发掘,不仅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且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和领域,即从史学批评和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特点。此外,赵俊《〈史通〉理论体系研究》、罗炳良《十八世纪史学的理论成就》、白云《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刘开军《晚清史学批评研究》等论著,也对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进行了发掘。

2. 有关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

将少数民族史学纳入中国史学史研究之中,这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自觉的史学意识。白寿彝指出“我们史学史将来要发展成全民族的史学史,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①“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②经过他的努力,少数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学界共识。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组织举办了全国性的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研讨,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论文集,推进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探讨,二是少数民族史学成就的发掘,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修史活动和各少数民族史学成就的研究。在理论上,学者就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史料进行了讨论。瞿林东认为,中国史学发展中,凡是有关各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少数民族政权及其统治范围内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同中原地区民族与政治统治交往的历史的记述,包括其作者的思想 and 撰述活动等等,都可视为少数民族史学范围。少数民族翻译汉文史书活动,也应视为其史学活动^③。汪受宽、罗炳良等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和补充^④。周文玖则认为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只能是有关少数民族史学家、以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史学著作、少数民族所建割据政权的修史机制和修史活动^⑤。瞿林东要求将汉文文献中有关少数民族历史记述的资料也作为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史料^⑥,东人达认为少数民族史学史料为少数民族文字史籍和口传史料,而以口传史料为主^⑦。不难看出,瞿林东强调的是历代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述和认识,中国史学史上多民族史学的撰述传统,周文玖、东人达关注的是少数民族在史学上的成就。这表明有关“少数民族史学”的理解还存在着分歧。

关于少数民族政权史学的研究,一是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史学、西夏史学受到重视。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⑧、赵荧《五凉史学述略》、《五凉史学家考》^⑨概述了五凉史官设置、修史情况、史家史书,及其对北魏史学的影响等,并对刘昞等11位史家事迹进行考证,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王志刚《十六国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史学发展》^⑩、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⑪等对十六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官制度进行梳理、研究。乔治忠、王秀丽《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

① 白寿彝《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14页。

②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叙篇》,第178页。

③ 瞿林东《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几个阶段》,载瞿林东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④ 罗炳良《略谈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定義、研究对象及史料范围》(《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汪受宽《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特点与定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⑤ 周文玖《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内容的思考》,《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⑥ 瞿林东《断代史学与民族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辽金元史学研究〉序》,《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⑦ 东人达《试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⑧ 《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

⑨ 《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

⑩ 《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⑪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义》^①详细地考察了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以及史学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任菲菲《西夏史学述论》^②概述了西夏史学发展过程、史家和主要成就,使人们对西夏史学有了初步了解。而宁夏、甘肃、北京等地的学者在西夏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将促进西夏史学研究。二是着重探讨史学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尤其是在历史文化认同中的作用。许殿才《魏晋南北朝隋唐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向燕南《10—19 世纪历史文化认同意识的发展》、吴怀祺《辽代史学与辽代社会》、吴凤霞《辽金元的经史翻译与历史文化认同》、何宛英《金代史学与金代政治》、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等论著,对此进行了探讨。三是有关少数民族政权史学研究专著的出版。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③系统地阐述了元代史学思想,指出元代史学形成了世界性意识以及强烈的历史借鉴和经世思想。吴凤霞《辽金元史学研究》^④展示了辽金元时期多民族史学发展的面貌。乔治忠有关清代官方史学的系统研究为少数民族政权史学的研究提供了范例。这些说明有关少数民族政权史学的研究已从零星走向系统。

对各少数民族史学作专门研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气象。向中银《试论彝族的重史传统》和《中国彝族古代史官制度初探》^⑤、东人达《中国彝族古代史学概述》和《彝文古籍与彝族史理论述》^⑥,对彝族史学传统、史官制度、史学理论都作了初步探索。东人达《南北朝彝族女学者阿买妮评述》^⑦分析了彝族史家阿买妮在历史记叙与史学理论方面的建树。阿地力硕士论文《维吾尔族史学发展研究(八——十七世纪)》^⑧、吾斯江曼·亚库甫博士论文《16 至 19 世纪维吾尔族史学史研究》^⑨以维吾尔族史籍代表作为核心,分别对 8 至 17 世纪、17 世纪至 19 世纪维吾尔族史学进行梳理分析。这两篇论文合在一起,就是一部维吾尔族古代史学史。吾斯江曼·亚库甫还撰写了《维吾尔族历史记述的体裁与风格》、《〈伊米德史〉及史料来源》等多篇研究维吾尔族史学论文。研究维吾尔族史家、史著的,还有刑剑鸿《略论〈伊米德史〉史学体裁体例兼其史料》、安尼瓦·巴依图尔《毛拉穆沙·莎依然米和〈伊米德史〉》、阿布都鲁甫·甫拉提《毛拉穆萨·莎依然米及维吾尔史学》、艾力·吾甫尔《关于佚名作者〈喀什噶尔史〉的几个问题》等。此外,从事维吾尔族史和西域史研究的学者也对维吾尔族史籍进行评介和研究。如魏良弢在《喀喇汗王朝史稿》、《叶尔羌汗国史稿》等文中分别对喀喇汗王朝、叶尔羌汗国时期的维吾尔族史籍进行评介。他所撰写的《沙·马合木·楚刺思〈编年史〉》^⑩详细介绍了这部维吾尔族史书的版本、作者、书名、史料价值。王尧、沈卫荣《试论藏族的史学与藏文史籍》^⑪有关藏族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与发展阶段的划分,对藏族史学史的研究影响深远。孙林在系列个案研究^⑫基础上撰写的《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较系统地梳理了藏族史学从起源到 20 世纪的发展历程及其阶段性特点,是第一部藏族史学史。王璞《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以藏文史籍代表作为中心,展示藏族史学的发展和特点。刘凤强《清代藏学历史文

① 《齐鲁学刊》2004 年第 4 期。

② 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0 年卷,社会文献出版社 2011 版。

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⑤ 《贵州文史丛刊》1997 年第 4 期,《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⑥ 《史学理论研究》1995 年第 1 期,《史学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⑦ 《贵州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

⑧ 新疆大学 2006 年。

⑨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年。

⑩ 《民族研究》1987 年第 1 期。

⑪ 《史学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3 期。

⑫ 系列个案研究主要有:孙林、张月芬《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和《藏族史学的起源与早期特色》,孙林《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总体风格和特征》、《盟誓文语: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元明时期西藏的综合史书的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笔法》、《伏藏著作在藏族史学发展史上的史学价值与地位》、《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从我国现当代藏族史学研究看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等。

献研究》将清代藏学历史文献区分为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分别予以评介。蒙古族史学历来受到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留金锁以蒙文撰写了《十三世纪——十七世纪蒙古历史编纂学》一书。乔吉 20 世纪 80 年代在《内蒙古社会科学》上连载《蒙文历史文献要览》,介绍重要的蒙文历史文献。希都日古《17 世纪蒙古编年史与蒙古档案研究》对 17 世纪的蒙古族史学和文献进行研究。乌兰《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对卫拉特蒙古史学和文献进行研究,出版的《〈蒙古源流〉研究》一书对《蒙古源流》进行了考证研究。李德锋《14——17 世纪蒙古族史学史述略》^①对蒙古族史学发展、蒙古族史学与其他民族史学之相互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李松茂曾倡议编写回族史学史,并对回族史学史的编纂提出纲领性意见^②。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一书中的学术史回顾部分,可以说是一部简要的回族史学史。学者还对马以愚、傅统先、金吉堂、马寿千、白寿彝、杨志玖等回族史家的学术成就进行了研究。

从以上有关论述可以发现,从事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学者,既有史学史研究者也有民族史研究者,既有汉族学者也有少数民族学者。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民族语言问题,促进了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发展。

三、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在开拓新领域的同时向纵深发展,提升了整体研究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史学通史的撰述、断代史学的研究与撰述、史学专题的研究,以及史家、史著的研究等方面,每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反映了四十年来史学史研究者的艰辛努力。

1. 有关中国史学通史的撰述

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史学史命名的通史性著作约有三十余部,这些著作反映了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一方面保留梁启超“史学史做法”的色彩,另一方面开始关注历史思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反映出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史部目录解题模式向新的研究模式过渡的特征。如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在叙篇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等,这既是对 60 年代有关史学史基本理论讨论的总结和完善,也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指示了方向。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基本上摆脱了“旧窠臼”,以“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为主线综合阐述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并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史学发展面貌。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史撰述的特点和水平。该书纵向阐述史学自身的萌芽、发展过程,显示史学在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横向揭示社会变动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力图历史地和逻辑地展示中国史学的面貌。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多年专题和个案研究成果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学术水平普遍较高,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谢保成《中国史学史》、乔治忠《中国史学史》、谢贵安《中国史学史》等将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推向了一个新高峰。如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从官方史学、私家史学之互动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历程与规律,从中外史学比较中探讨史学发展机制,关注史学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史学在东亚的影响等,显示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研究的深入。

2. 有关断代史学的研究与撰述、专题与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断代史学史的研究与撰述、专题与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这是中国史学史学科走向深入的重要表现。瞿林东、乔治忠等在有关文章中对此已经做了较为详

^① 《内蒙古大学学报》2013 年第 6 期。

^② 《编写回族史学史的构想》,《史学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

细概述,此不赘述^①。需要指出的是有关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断代史学史研究的热点,无论是有关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宏观认识,还是具体研究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戴逸、林甘泉、瞿林东、王学典等从不同的角度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进行整体估价。戴逸认为 20 世纪中国史学有三个特点,一是进化史观的引进,二是唯物史观的学习与运用,三是理性精神的张扬或曰理性的发醒。瞿林东认为 20 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与撰述,最大的教训是实事求是为史学的最高品格。王学典以史观派与史料派的沉浮为主线梳理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脉络,认为百年中国史学可以说是史观派和史料派的对抗史。在专题研究方面,贯通性的专题研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在这方面成果颇为丰富。最近出版的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近代史学》、尤学工《20 世纪中国历史教育研究》、朱慈恩《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汪高鑫《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研究》等著作,就中国史学发展的某一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多为创新之作。有关史家、史著的研究,是史学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史学名家名著则是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新进展,一些高水平的史家评传、史书研究著作不断出版。如陈其泰《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②揭橥班固撰《汉书》“过秦”“宣汉”主旨,改变了以往对班固与《汉书》正宗史学代表的刻板印象,有助于恰当评价其在史学上的地位。

四、文献资料的建设

1980 年出版的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中国史学史论集》揭开了新时期中国史学史资料建设的序幕。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王学典主编《20 世纪中国史学史编年》、龚书铎、瞿林东主编《中华大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等,则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③按年代顺序汇集从先秦到明代有关中国史学的重要资料,举凡史家的史学活动、史著成书过程与内容、史学思想、历史观念、官府修史和史馆设置等都囊括于其中,尤其注意官修史书、史官制度方面的史料,也重视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活动,以“案”语的形式对有关史实进行论辩、考证,所引史料皆标示出处。杨翼骧“以著作家的史识和总揽史学发展全局的眼光而致力于资料纂辑”^④,以史料的形式呈现中国史学发展史。案语中有关史料年代的推断、史家生卒年的考定,史实的考辨,体现了其深厚的史学素养。学者认为,《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兼有很高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是一部嘉惠后学的佳作。

杨翼骧去世后,乔治忠、朱洪斌对《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进行增订,一是对原书进行了修订,如校改原书的错讹文字,增补一些必要的史料,调整或修改一些史料的系年,所增案语则题为“今案”。二是续成清代部分。此卷义例仍依前三卷,但在史料的采择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如采录日本藏中国史籍资料、清代档案资料,收录一些不属于史学范围但对史学发展影响很大的书籍、事项。案语增加了一些学术信息和编者的判断。由三代学者接力完成的这部《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⑤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础建设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20 世纪中国史学编年》^⑥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详细地反映 20 世纪中

① 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 3 期)、《新发展 新成就 新境界——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 3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乔治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2009 年第 9 期);钱茂伟《近二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史学月刊》1999 年第 6 期)等。

② 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③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第 1 册 1987 年,第 2 册 1994 年,第 3 册 1999 年。

④ 蓝天海《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史学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

⑤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⑥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出版。

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整体面貌。该书吸收了纪传、纪事本末、学案、专题研究之长,以弥补编年体的不足,以便容纳更多的资料。与《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相比较,其内容更为丰富。凡是与史学有关的政治、思想、文化大事,重要史学主张和史学思想的提出、重要史学论争与事件、史学理论的建构、历史文献的发现与整理、重要考古活动、史学社群的活动、中外史学交流、历史教育等,以及史家生平经历、学术交游、刊行的主要著作、文集及报告,有较高学术价值或社会影响的论文等,都予以采录。在资料的辑录方面,也不像《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那样照录原文,而是对原始资料进行概括,更多地反映编纂者对有关史学事迹的认识、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作,也是学者了解20世纪中国史学的入门之书。

《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①是一部大型类书,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所录资料以史部为主,兼及经、子、集部。设有历史理论总部、史学理论总部、史学史总部,三个总部下设52部,部下视需要设纬目,辑录了有关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论述、有关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和论述方面的史料,以及有关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径、趋势、史学成果、史家生平和著述等方面的史料。本书有关文献资料的分类,反映了编纂者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如将历史理论分为论天人、论古今、论地理、论时势、论华夷、论国家、论正统、论分封、论兴亡、论鉴戒、论风俗、论人物等十二部类,反映了编者对历史理论丰富内涵的认识。为方便学者参考和检索,本书所录资料都有明确标目,包括书名、卷次、篇名等。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从纵的方面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和进一步探索的线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则从横的方面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丰富的文献。这三部著作共同构筑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基础建设的基石。此外,杨翼骧审定,乔治忠、姜胜利编著《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刘杰华主编、叶振华、乔治忠、姜胜利等人撰《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林平《宋代史学编年》、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王学典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瞿林东主编《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乔治忠编《中国史学史经典精读》、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和《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邬国义校《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张越《史学史读本》、杨共乐总主编《〈史学史研究〉文选》等有关中国史学史文献资料搜集整理之作,也对促进中国史学史学科基础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有关数字史学的探讨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对历史研究资料的搜集、研究方式、人员的构成、成果的发表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将网络时代的历史学称为网络史学、数字史学、量化史学或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信息化的历史学、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2015年山东济南举办的第22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第四场会议的主题为“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就“数字化历史:挑战和可能性”、“新工具、新叙事与新历史”这两个议题进行研讨。所谓“数字史学”是指运用数字媒体和工具开展的历史学实践、演示、分析和研究^②,这反映了计算机信息时代史学的特点,可以用其来指称网络时代的历史学。史学界有关数字史学的探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信息技术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二是数字化时代史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三是历史研究者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旨在探讨历史学如何利用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推动自身发展,以及迎接大数据时代的挑战。

1. 关于数字网络信息技术对历史研究的影响

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网络信息技术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几个方面:第一,数字网络信息技术改变了史料的存在形态与史料检索、阅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周兵《历史学和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史学研究的效率。首先是改变了史料存在形式,即在纸质载体史料之外,产生了主要以电子文本方式存在的新样态史料。这种史料以网络为储存空间,既有传统典籍经过数字化技术处理所生成的数字化史料,也包括在数字化时代产生的并以数字化方式存在的史料。其次,引起史料检索方式的变革。学者指出“数字化检索已经成为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史家对于史料的获取方式经历了亘古未有的革命。”^①数字化检索一方面节省了查找史料的时间,另一方面实现了资源共享,史学研究的效率因此提高,也使以往学者难以涉足的问题变得容易。陈春生指出“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花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对比、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在计算机网络上花费数秒钟、数分钟就可以有相当确切的结果;而原来因为缺乏史料,许多传统历史学家认为不能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变得有点‘唾手可得’。”^②再者,数字化时代主要依赖互联网、数据库检索研究成果和所需资料,很少有人系统读书。

第二,改变了历史知识传播的方式。互联网代替纸质媒介成为历史知识传播的主要平台,史学成果传播的速度加快,互联网上发布历史知识无需审核,比纸质媒介更加灵活随意。这种发表的自由和简便,为一些难以在纸质上发表的题材提供了空间,也为大众参与历史研究提供了舞台。

第三,历史研究成员结构发生了变化。获取史料的便捷与发表成果的自由,降低了从事历史研究的门槛,历史研究向大众敞开了大门。学者指出“互联网的普及和利用,特别是网络论坛和微博这种‘自媒体’的出现,人人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并没有能实现,但人人成为历史的记录者、研究者却有了现实可能性。”^③网络时代,历史学家已不可能垄断历史知识的话语权了,非历史专业者大量涌入历史研究领域,其在社会上的影响甚至超过专业历史研究者。

第四,历史学形态发生了变化。发表的自由和历史研究成员结构的改变,引起了史学形态的变革,一是从庙堂之学走向公众之学。姜义华指出,信息时代人们可以自由在网络上书写自己的历史,参与地方、国家历史的书写,发表对历史问题的评论,并借助于网络迅速传播,对专业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大数据时代推动历史学从庙堂之学走向公众之学。”^④李剑鸣将这种状况称之为历史学的“民主化”:“同政治民主中的商议和决策辩论一样,史学中的‘民主’一方面表现为参与者的增多,另一方面则是学术声音的多样化。”^⑤二是从事实性史学向思想性史学转变,从知识性史学向问题史学转变。李振宏认为,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所需历史知识,历史学家能够向社会提供的不再是历史知识,而是他的思想个性、学识和判断力,他所形成的不同于他人的问题意识,提出的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这样历史学也就从传统的事实性史学转变为思想性史学、知识性史学发展成问题性史学^⑥。

第五,贯通性的研究成为可能。进行贯通性研究,不仅需要学识和眼光,而且需要有丰富的历史资料予以支撑。互联网时代,因史料搜集、存贮的便捷,以及数据库方法的使用,为贯通性研究提供了资料和方法支撑。

尽管数字信息技术引起了历史学的巨大变化,但在史学研究者看来,这些变化大多发生在方法层面,并没有引起历史观的变革,也没有改变历史学的学术性质。李剑鸣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网络主要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方式,却没有在历史观方面造成实质性变化。”^⑦这种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学者对数字化时代史学的认识。

① 刘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② 陈春生《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

③ 马强《“自媒体时代”的历史研究和史学表达》,《团结报》2016年3月17日。

④ 姜义华《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9日。

⑤ 李剑鸣《“网络史学”的神话与实际》,《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⑥ 李振宏《论互联网时代的史学》,《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

⑦ 李剑鸣《“网络史学”的神话与实际》,《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2. 关于数字化时代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

数字信息技术在促进史学研究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引起了学者的深思。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一、如何处理史料检索与读书的关系,二、如何高效率处理和运用史料,三、如何保障历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数字化时代,通过互联网、数据库检索资料,于是出现了以史料检索代替读书的史学研究现象。面对这种现象,学者指出“通过搜索获得的信息是支离破碎的。数字检索不能替代读书,是学界的共识。”^①因为,网络检索往往会将“隐性史料”遗漏,也会造成对反证材料的忽视。何况,还有不少的史料尚未数字化。因此,学者强调在网络时代治史仍然需要读书,“在网络信息时代,认为有了学术资料数据库就可以轻松治史了,显然是不正确的。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直接取用具体的史料,出错的几率颇高。为提高史学研究水平,读书治史的理路不可抛废”^②。

传统时代史学研究面临的是如何爬梳所需史料的问题,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是如何高效地处理海量史料问题。刘爽指出“数字化时代史研究所面临的主要困惑之一,是史料的处理和运用。”^③王文涛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数字资料搜集方便快捷,衍生出新的问题:如何高效处理检索到的数字资料?”^④

数字化时代出现的以检索代替读书,以粘贴伪装学问现象,使快餐式成果大量积累,历史学出现了虚假繁荣。互联网在加速历史知识传播的同时,也为那些粗制滥造的所谓历史新诠释、历史新故事争夺史学话语权提供了平台。因此,在数字化时代如何保证学术质量成为史学研究者不得不关注的问题。

3. 关于数字化时代史学对研究者的基本要求

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史学研究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何应对变化了的史学,这是史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学者认为,在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者熟练地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之后,第一,应加强史学基本功的修养,第二,应有人文情怀。

数字信息技术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要准确分析、鉴别和合理地运用史料,关键还是史家的才识和学养。李振宏认为,利用互联网检索资料,省略了十分重要的阅读文献过程,因此研究者对文献的理解、历史背景的把握、材料的分析全靠已有的史学专业基础。所以,在数字化时代应更加重视史学研究者的专业基础训练。陈春生指出,数字化时代“占有所谓冷僻资料或发现新资料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毫无惊喜可言。”对历史学家的要求将从博闻强记转到见识方面。“历史学家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新的学术时代衡量史学研究成果优劣高低的更重要的尺度。”^⑤因此,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和史识的培养十分重要。

数字化时代,因史料的异常丰富,微观史学研究将更趋广泛和深入,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也将更趋严重。学者认为,史家一旦陷入史料的无限之境而不能自拔,就极有可能失去从整体上描述历史的能力。沉溺于细节,史学的社会价值便无从体现,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史家需要有大情怀。“如果不想失去在本学科领域的话语权,史学家就必须借助大叙事高扬人文情怀。唯大情怀者才能驾驭好大数据、利用好大数据,书写出真正关注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伟大叙事。”^⑥

互联网、数据库对史学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正在改变历史研究的方式、形态。有关数字化史

① 刘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② 乔治忠《治史仍需以读书为根基》,《人民日报》2018年4月23日。

③ 刘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④ 王文涛《信息时代的文献阅读和史料检索》,《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⑤ 陈春生《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

⑥ 许兆昌《大数据时代史学更应有大情怀》,《人民日报》,2018年01月29日。

学的探讨,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就是对史学发展最新趋势的关注。这种探讨,旨在通过对数字信息技术对史学所产生影响、史家在数字时代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迎接大数据时代挑战的分析,促进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

六、有关中国史学史发展前景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研究的深入,以及文献基础的建设等,标志着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情况下,如何超越已有成就,开拓中国史学史研究新局面,成为学者所面临的新问题,正如瞿林东所指出的“‘历史科学的生长点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①。近年来,不少学者在思考这个问题。以下几个方面是学者为推动史学史学科发展所提出的建议:

1. 加强理论研究,尤其是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瞿林东指出,中国史学有丰富的理论遗产,为了展现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推动中国史学史进一步走向世界,应当把理论问题提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②。李振宏认为,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还存在不少重大的理论问题,诸如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史学观念及其与历史观念的关系问题,史学观念与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史学观念与一代史学发展状况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研究这些理论问题,将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科学水平和学术品位,改善学科的基本状况^③。

2. 开拓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李振宏指出“每一个新的重大研究领域的开辟,都带来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发展,新阶段。瞿林东先生、吴怀祺先生的史学史研究道路充分证明,新研究领域的开辟对于拓展史学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④这说明,开辟新领域是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3. 加强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是中国史学史发展新路向之一,在不久的将来定会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乔治忠指出,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既要进行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也应进行中日、中朝(韩)、中越史学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发现史学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发展,凸显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问题,以此作为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将会带来中国史学史认识体系的重大更新,促进研究水平的全面提升^⑤。

4. 拓展研究视野。一是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⑥。这样,有关中国史学在国际上的传播、交流及其影响,将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二是在东亚视野下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关注中国史籍的流播、演变,周边各国对中国史学的学习与改进,并系统考察周边各国修史制度对中国的模仿和变异,从而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和方向^⑦。

5. 加强专题研究。要进行贯通性的专题研究,即以通识的眼光对某一专题作通的考察和论述,这方面还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研究。罗炳良认为,史学思潮、史学批评范畴是可供开拓的两个重要领域。史学思潮的研究将有助于从更深层次认识中国史学发展规律,史学批评范畴的研究在促进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同时,对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也有学术价值^⑧。

6. 改进研究范式。关于现有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学者认为,在内容方面,应将史学运行的

① 瞿林东《“历史科学的生长点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北京日报》2017年6月26日。

② 瞿林东《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向》,《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③ 李振宏《开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的思考》,《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

④ 李振宏《开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的思考》,《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

⑤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与中外史学比较》,《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

⑥ 朱政惠《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

⑦ 孙卫国《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2013年11期。

⑧ 罗炳良《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构想》,《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

制度层面要素、史学与社会公众的互动纳入其中;在研究方式上,应采用多学科方法,尤其要吸收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此外,有关史学思想、理论的研究,应结合相关的史学实践进行,应当将史学思想或理论的研究与史家、学派交往等活动结合起来,更好地从动态中去把握史学的发展。同时,还须加强学术史的内涵,这样研究成果才能引起历史研究者的重视^①。

以上这些有关中国史学史今后发展路向所进行的思考。还应该补充的是,在数字化时代开拓中国史学研究新局面,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数据库所提供的便利,探索那些以往因史料的限制难以研究或还未解决的问题。互联网、数据库也为从事贯通性史学史专题研究提供了可能。这些都能为史学史研究提供生长点。

回顾是为了发展,总结是为了开拓。通过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回顾,不难发现,解放思想,转换思维,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关注中国历史学的最新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活水源泉。有此活水源泉,学者期待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必将再创辉煌。

^① 胡逢祥《关于改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之我见》,《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

The Progress of Historiography Study in China in the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Zhao Meichun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s made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since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creating catalogues and interpreting historical books was outmoded, a new paradigm focusing on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times has been created. The research has extended to new fields,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histor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of ethnic minorities are unprecedented. Besides, issues of general Chinese history, history of dynasties, specialized history have been studied in a deep-going way, and the sorting out of materials paves the way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historical research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to. The progress represent a new peak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after the previous one in 1930s - 1940s.

[Key words]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ese historiography progress

(责任编辑 汪高鑫)